

罪孽的报应：如何叫醒装睡之人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实习生 董诗妮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自编自导炸毁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突然袭击并侵占了沈阳城和东北30多座城市。这一天成为日本大规模武装侵华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正式发动侵略之日。自此以后，直到1945年，中国大地惨遭侵略，暴行让无数生灵失去了生命。

如今，94年过去了。同样是二战侵略国、战败国，皆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罪责，战后德国和日本“应对”各自战时罪孽方式却不同：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担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

为何德国能“觉醒”，日本却始终“装睡”？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正围绕这一话题展开。它不是一本传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政治游记”——作者穿梭于柏林与东京，广岛与奥斯威辛，教科书编辑部与战争纪念馆之间，用对话、观察、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的碎片，拼出了一幅关于“罪与罚”的图景。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吕昱、董诗妮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根源是“不负责任的体制”

布鲁玛想知道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还有历史如何被记忆、被扭曲、被利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走遍德国与日本，访谈学者、教师、政治家、老兵、艺术家，甚至右翼分子。他参加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也参观柏林犹太博物馆；他听家永三郎讲述教科书诉讼三十年，也听保守派议员辩解“南京大屠杀是夸大”；他关注德日两国关于反思战争的书籍、戏剧、电影、电视节目。

最终，布鲁玛得出结论：德国与日本的差异，不是文化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不是“罪文化”与“耻文化”的区别，而是宪政体制、教育理念、政治精英与公共讨论空间的差异。他拒绝用“文化差异”来简单解释一切，也没有步《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的旧路，不认为德国人天生有“罪感”、日本人天生有“耻感”。他指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如何面对过去的，不是民族性，而是政治结构。

德国战后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彻底重构，纳粹被彻底清算，宪法爱国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尽管“竭力遗忘”与“无法哀悼”的心理也曾一度困扰德国人，但他们最终选择正视历史，用异常残酷的方式面对自己的记忆，“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不惮于留存，并且在反复诘问中警惕它的消退。

而日本呢？天皇制被保留，战犯换一身衣服继续掌权，宪法是美国写的，自卫队是“违宪”的——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不负责任的体制”。布鲁玛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

在追溯东京审判的历史时，布鲁玛引用日本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的观点，战前的日本政府就处在“不负责任的体制”之下，有着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比如节庆期间的抬神轿活动），“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界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

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

为了在经历可怕的事情之后活下去，每个人会不自觉地筛选、重组自己的记忆。曾在南京驻扎的日本兵东史郎在暮年时，公布了自己的战争日记。他曾反思，审判是件好事，但日本人应该获准设立自己的军事法庭。令他尤其愤怒的是，一份名为《昭和天皇的独白》，这份记录于1946年，于1991年方才出版的小书。书中显示，天皇不仅对局势一清二楚，好战，还自私自利。东史郎说：“我们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为他战死，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曾遭苏联俘虏的日本兵小熊谦二，感慨自己参加的那场“圣战”：“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养家糊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

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这种无机物状态，源于日本始终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人权和人的尊严。

“受害者的”“鸵鸟心态”

日本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布鲁玛认为，日本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上文所提的“不负责任的体制”，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

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

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架构与日本的民族记忆，共同构筑了一个双螺旋结构。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在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权主导下，日本人不是忘记历史，而是选择性记忆。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他们牢记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却模糊了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身份。广岛和平纪念馆成了“和平的麦加”，却绝口不提广岛本身曾是日军第二大本营。早在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作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

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是一种精妙的心理机制：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就能逃避加害者的责任。布鲁玛批判日本特殊的“后见”做法，批判其经由选择性记忆维系伪善的和平主义认同。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对历史的“鸵鸟心态”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

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对日本的行为，人们需要进行双重反思：将一己的罪孽消解在全人类的罪孽中，逃避承担自身罪孽的责任；而对和平主义的准宗教态度，又预先封闭了世俗化讨论的可能，仿佛阐释的意图本身就充满不道德。日本的“后见”态度表明，当记忆的留存本身成为一场政治、文化斗争，对何谓历史“真实”的把握极易走向片面，甚至从历史认知的环节中剥离。

布鲁玛对德日在战后反思的差别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正如学者徐贲所评价：“布鲁玛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

当然，也有读者在读后感中反思：“德国人是否也在‘表演忏悔’？日本是否永远无法醒来？”也有批评者认为，布鲁玛是否过于理想化德国的“悔罪模式”，忽略了其内部的争议与反复？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至今仍在被阅读、被讨论、被引用。今天，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个民族心中的幽隐。

装睡的人叫不醒，不是因为睡得太深，而是因为醒来太痛。这本书，正是布鲁玛用笔尖轻轻敲击那个装睡者的肩膀——一次又一次，耐心而坚定。直到某一天，也许有人愿意睁开眼，看看真实的世界。而我们能做的，尤其在这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当下，就是站在真相和时间一边。

相关阅读：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约翰·W·道尔《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中信出版集团

4.安德鲁·N·布坎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东方出版中心

东京审判现场

以小山大城

□ 顾益康

针对我国部分县域面积小、人口分散、经济基础薄弱等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种城镇化发展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人口、产业向县城及周边重点镇集聚，打造县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小县城的核心逻辑不仅在于空间重构，更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县域内生动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多维跃升。

从东南山城到西南腹地，小县城战略的实践成效已清晰可见。首先是以人口集聚撬动城镇活力。以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为例，该县通过实施小县城战略，引导高山、边远山区农民下山转移，推动人口向县城集聚。该县已有超过58%的农民下山转移，80%的人口集中在县城居住，城镇化率高达7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集聚不仅释放了人力资源红利，更催生了消费升级与服务业繁荣，使县城从“空心化”转向“强磁场”。

其次是以特色产业驱动经济转型。在小县城战略推动下，各地纷纷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如浙江省安吉县依托竹产业优势，打造竹制品加工、竹文化旅游等产业链，实现了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型升级。又如福建省德化县以小县城战略为支点，推动陶瓷产业与文旅融合，从闭塞山区蜕变为“世界瓷都”。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引入，进一步丰富了县域经济的韧性，彰显“小而精”的发展魅力。

再次是以城乡融合弥合发展鸿沟。小县城战略强调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式，缩小城乡差距。如重庆市丰都县在实施小县城战略过程中，注重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水平，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同时推动县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实现了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最后是以生态优先锚定发展底色。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小县城战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各地通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推广清洁能源等方式，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浙江省庆元县在实施小县城战略过程中，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范式。

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小县城这一发展模式将为更多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周立教授与罗建章博士深耕城乡可持续发展领域多年，以学术洞见与政策实践的双重视角，系统解构了小县城战略的理论逻辑与地方经验。书中既对小县城演进脉络进行了宏观梳理，又聚焦德化县等典型案例，剖析基层政府如何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劲，破解土地、资金、人口等核心难题。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回避当前面临的挑战，如何平衡集聚效率与公平、如何应对产业升级阵痛、如何规避“千城一面”风险等议题均被纳入深度探讨，进而为决策者与实践者提供了兼具前瞻性与操作性的启示。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金冲及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部阐述20世纪百年中国复兴之路的经典历史著作。全书共4卷，达百万余字。从20世纪前夜的甲午战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写起，止笔于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作者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梳理，总结中国在一百年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并解读巨变背后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从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中国奋斗，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

《体贴》的算法

数据如何重塑生活空间

【美】马克·谢泼德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中，也许我们一直过度关注技术的工具性，而忽视了技术的生存性。技术作为一种人类改变世界和分析世界的方法，也逐渐影响着人类对自我的认知。通过统计数据、数字模拟，人类增加了对世界的了解和控制，同时也增加了对技术的怀疑和不确定。真实的数据被窃取，并用于捏造数字空间中的假象，用户开始相信假象。我们应反思数字虚拟中蕴含的本质性权利，避免可能带来的灾难。

《寻迹古中国2》

翟德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基于自己的考古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文物知识，行走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不仅准确解读了考古发现背后的历史信息，还以生动有趣的笔触，将这些复杂的史实知识转化为普通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内容，并根据现场对于一些疑点和争议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 蔡可心 整理）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 吴真

这是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华北和长江下游所有的人都在搬，整个中国都在动。播迁到大后方的许多人流离失所，亲人离散，冻饿道侧，死于轰炸，枪弹，刺刀之下；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则被认为贪图安逸，被“自由区”的朋友视为伪民、顺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他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讲述的，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

1938年春，巴金在回答一位身处沦陷区的小读者来信时说：“这里还有一两百万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

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翻看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发表的文章，“忏悔”“赎罪”“过错”“悔过”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体现了文化人普遍的道德危机感，以及由于自我道德的拷问而引发的“罪感”心理。同样，在郑振铎的公开文字和日记中，也能看到这样一种思想挣扎，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

郑振铎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名干将，当时“打倒孔家店”的人们把线装书全送到厕所里去，与古籍略有沾染的人都被视为封建余孽。可是，1937年底，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这样一位五四宿将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1940年7月，郑振铎发表《保卫民族

文化运动》一文，号召有理智者：“在这最艰难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项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主编茅盾、楼适夷在编后记中说：“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抢救民族文献，对于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迂远”，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

抢救保全文物古籍，并非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是郑振铎自觉承担起来的文化责任。当全民的责任落到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还是在上海“孤岛”苦守的个人身上时，原来“躲避在上海”的道德负罪感之上，又多加了一层“万一失败则成罪人”的历史负担。郑振铎认为，个人作为文化的传承保存

者，如果听任民族文献流出国外或者毁于战火而无所作为，那便是千秋罪人，百身莫赎。

由于留居租界避难地，脱离了大后方的抗战集体，郑振铎始终抱有很大的内疚和负罪感，从而将抢救古籍当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敌暗斗，将保全民族文献视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与考验。他在1940年9月1日致“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现实军事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郑振铎等人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主动进攻的战斗。

全面抗战八年，正值郑振铎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的人生黄金时期，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爽一万五千余种”。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历源大街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5:30 印完8:15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